



On Scientificalness  
and  
Rationality  
in Foreign  
Policy – Making

外交学院学术丛书

# 外交决策的 科学理性探析

*On Scientificalness and Rationality  
in Foreign Policy – Making*

● 陆晓红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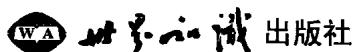


世界知识出版社

# 外交决策的科学理性探析

On Scientificalness and Rationality  
in Foreign Policy-Making

陆晓红◎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外交决策的科学理性探析 / 陆晓红著. —北京: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12.9

ISBN 978-7-5012-4327-3

I . ①外… II . ①陆… III . ①外交政策—研究

IV . ①D80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90326 号

责任编辑

杨志芬

文字编辑

符沛迪

责任出版

刘 谙

责任校对

马莉娜

书 名

**外交决策的科学理性探析**

Waijiao Juece de Kexue Lixing Tanxi

作 者

陆晓红

出版发行

世界知识出版社

地址邮编

北京市东城区干面胡同51号 (100010)

网 址

[www.wap1934.com](http://www.wap1934.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京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印张

720×1020毫米 1/16 23印张

字 数

340千字

版次印次

2012年10月第一版 2012年10月第一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12-4327-3

定 价

40.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获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专项资金资助

# 目 录

## Contents

<b>序 言 全球化时代呼唤外交决策的科学理性</b> .....	/1
一、冷战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受到挑战 .....	/1
二、冷战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受到的主要挑战 .....	/4
三、文献综述 .....	/10
四、论文框架、创新及研究方法 .....	/27
<b>第1章 科学理性的哲学溯源</b> .....	/32
第一节 西方对理性与合理性的哲学思辨 .....	/32
第二节 中国哲学理念的理性意蕴 .....	/45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实践理性观及现实意义 .....	/56
<b>第2章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及其实质</b> .....	/69
第一节 自由主义和现实主义范式下的理性 .....	/69
第二节 科学行为主义中的理性主张 .....	/77
第三节 新现实主义与新自由主义中的理性 .....	/81
第四节 主流建构主义外交思想中的理性 .....	/89
<b>第3章 对西方外交思想中的理性概念的反思</b> .....	/93
第一节 对美国外交决策的反思 .....	/93
第二节 外交决策中的理性与不理性 .....	/104
第三节 西方理性主义外交决策分析新视角 .....	/110

<b>第4章 外交决策的科学理性要素与评判标准 .....</b>	/129
第一节 外交决策的科学理性要素 .....	/129
第二节 理性认识国际体系与自我定位 .....	/131
第三节 理性认识文化、价值观差异 .....	/138
第四节 理性认识国家对遵守国际法、国际条约的义务 .....	/142
第五节 科学理性认识全人类的利益 .....	/155
<b>第5章 外交决策制度的程序理性 .....</b>	/162
第一节 理解程序理性 .....	/162
第二节 个体理性与集体理性 .....	/170
第三节 完全理性与有限理性 .....	/176
第四节 沟通理性与危机处理 .....	/193
<b>第6章 应对全球性问题挑战需要科学理性 .....</b>	/204
第一节 应对国际恐怖主义挑战需要科学理性 .....	/204
第二节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需要科学理性 .....	/218
第三节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科学理性合作 .....	/240
第四节 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凸显科学理性 .....	/256
<b>第7章 冷战后中国外交决策的理性选择 .....</b>	/271
第一节 中国对国际体系和自我身份的新认识 .....	/272
第二节 冷战后中国外交决策彰显实质理性 .....	/286
第三节 冷战后中国外交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 .....	/297
第四节 构筑“和谐世界”体现中国的全球观 .....	/314
<b>结束语.....</b>	/324
<b>参考文献.....</b>	/326
<b>致谢.....</b>	/358

# 序 言

## 全球化时代呼唤外交决策的科学理性

### 一、冷战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受到挑战

东欧剧变、两德统一、苏联解体标志冷战两极格局的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形成的地缘政治格局彻底改变，世界因此进入后冷战时期。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恰恰与经济全球化快速发展同步。经济全球化使各国之间的相互依存加深，人类社会在享受科技进步成果的同时，也凸显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发展差距扩大的不平衡。联合国通过《联合国千年宣言》，但未来的国际关系格局向何处发展仍存在不确定的因素。国际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受到唯一超级大国的公然挑战。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没有因为两极格局的解体而退出历史舞台。国际恐怖主义和霸权主义均对国际社会的稳定构成挑战。世界多种文明在相互交流交融的同时，也出现弱势群体对强势群体的挑战；发达国家内部社会结构的变化；新兴国家经济体在快速发展的同时内部的不平衡。

人类的理性思维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提出了反思，人类不再迷信实力政策（大棒政策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而相信综合国力和国际法原则、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指导下的软实力的作用。1989年东欧剧变的一个重要而深刻的教训是，经济实力在东西方竞赛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在塑造着全球的地缘政治格局。冷战后，推动全球力量变化的最主要的因素，并非同以往一样，是单一的军事胜利决定地缘政

治格局调整，而是以高科技为代表的全球经济的快速增长和各国经济实力的此消彼长。世界人民期待建立每个国家都受到尊重，各国都能平衡发展，体现公平正义原则的国际社会。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秩序，特别是国际金融秩序成为二十国集团的普遍共识。

在冷战期间，形成以美国为首、以北约军事集团为依托的西方国家集团和以苏联为首、以华沙条约组织为依托的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集团对峙格局。与此同时，还存在坚持独立自主外交的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奉行不结盟政策的不结盟集团，出现三种政治力量并存于国际体系的总体态势。

在总体两极对峙格局中，众多的发展中国家有不同的选择，或依附于某个国家集团，或奉行不结盟的政策，或坚持中立的政策，在东西方对峙格局中寻求自己的安全环境。20世纪90年代便开始出现了因国家经济运行不良导致不断衰落的国家。这些国家由于其内部动荡，成为国际热点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经济“无效国家”<sup>①</sup>大都集中在亚洲和非洲，因此亚洲和非洲又成为国际恐怖袭击和内部战乱伤亡人数最多的两个地区。

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的资本、贸易、技术和人员加速流动。随着国际市场的变化，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也发生剧烈变动，全球性国际问题的挑战日益凸显。伴随冷战格局的解体，原来统一的国家衰落分裂，新独立的国家围绕疆界划分、历史上形成的民族隔阂而发生局部对抗甚至流血冲突。在大国关系总体稳定的同时，局部地区动荡，热点增多，成为国际及地区安全的最大威胁。

冷战后大国关系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方面，大国间保持总体合作的态势，不再视对方为首要的安全威胁。世界主要大国一致认为跨国的全球性问题，例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国际恐怖主义、内战引发的人道主义灾难等，成为最严重的安全威胁。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都清醒地

<sup>①</sup> 在这里借用赵汀阳先生的“无效国家”解释，用于指一个国家在功能上基本失效而导致社会混乱。见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112页。

认识到，它们无法单独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无法确保本国公民不受伤害。国际社会因此达成共识，只有通过国际合作，重视联合国等国际组织的核心作用，通过建立各种集体安全体系网络，同时各成员国应遵守国际安全规则，才能降低跨国非传统安全问题威胁，确保本国人民和国家的安全。

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坚信其价值体系就是普世价值，其外交政策就是要确保国家的绝对安全，享有绝对优势，而不受任何国家的潜在挑战。美国的军费开支始终超过维护其国内安全的水平，多年来一直远远高于其他国家军费开支的总和。美国外交战略的核心目标就是竭力输出本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价值观。美国以维护国际秩序为名，对外连续发动侵略战争，推翻不符合美国胃口的政权，武力占领那些并未对其构成直接威胁的国家，试图扶植听命于美国的政权，从而确保美国的资源安全与政治安全。小布什政府拒绝批准或退出有关人权、气候治理和防止武器扩散的多项重要的国际条约，公然提出所谓“先发制人”的行动原则，严重违背了联合国宪章中公认的“自卫原则”及评判标准。

事实上，冷战后大国关系的这两种趋势正在世界舞台上共存与较量，前者或称安全相互依存（security interdependence），后者指美国凭借超强军力确保绝对安全。这两种趋势都是史无前例的。就前者而言，历史上欧美等国家为追求安全优势，曾迷信结盟政治，用军事同盟条约结成相互对立的军事同盟；但军事同盟不能为解决国际争端问题而协调与合作，最终走上以武力解决争端问题的道路，导致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罹难。后者追求绝对安全，迷信自身军事实力与霸权。今日的美国已超过历史上的任何霸权国家，在世界范围内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对其构成安全威胁，但美国仍竭力维护其绝对利益和绝对安全。因此，在冷战后，世界多极化和单极化两种主张扭结在一起，相互较量。正是美国这个超级大国挑战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其超强军力使之主导了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主导趋势，单边主义大行其道，而不受抑制。与此同时，美国又试图扮演公平正义的“维护者”和“领导者”，但理念和行为相悖，难以获得其他国家的信任。试想，霸权当道，何以论国际公道？

## 二、冷战后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受到的主要挑战

全球化时代呼唤外交决策的科学理性，正是针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现实。因此我们必须对冷战后的国际关系有足够清醒的认识，弄清引起世界人民担心的究竟有哪些违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表现，笔者认为表现如下：

### 1. 超级大国滥用武力，违背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

和冷战时期相比，冷战后的国际关系中动用武力的次数明显增多，动辄使用武力已成为常态。<sup>①</sup>对中小国家而言，冷战后建立和平、公正的国际新秩序的希望似乎已荡然无存。美国依仗其超强军力，成为冷战后二十年里使用武力最多的国家，其结果是推翻南斯拉夫、阿富汗和伊拉克三国不符合美国意愿的政权，同时美国霸权主义的消极影响也急剧上升。

1989年12月，美国对巴拿马实施侵略性的“正义事业”(Just Cause)行动。这是美国在冷战后的第一次军事行动，距柏林墙倒塌仅两个月；1990年12月，美国发动对伊拉克的“沙漠风暴”(Desert Storm)行动；1992年12月，美国在索马里实施“重建希望”行动；1993年6月，美国对伊拉克情报大楼实施空袭；1998年8月20日，美国对本·拉登在阿富汗的训练营地实施导弹打击；1998年12月，美英对伊拉克实施代号“沙漠之狐”的军事行动<sup>②</sup>；1999年3月，美国伙同其北约盟国，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对南联盟进行轰炸；2001年11月，美国又伙同英国、携手欧洲新盟友，抛开老盟友，再次在未获得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情况下，悍然发动阿富汗战争，推翻了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权；2003年3月，

<sup>①</sup> Marcelo G. Kohen, “The Use of Force by the United States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and Its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Law”, *United States Hegemony and the Founda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eds. Michael Byers, George Nolt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197.

<sup>②</sup> 1998年12月，美英两国在未经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实施了代号“沙漠之狐”军事行动，对伊拉克进行了长达70个小时的大规模攻击。使遭受八年制裁之苦的伊拉克雪上加霜。

美国再次未经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发动对伊拉克萨达姆政权的大规模战争，引起西亚中东地区的局势动荡加剧。21世纪初美国发动的两场局部战争是在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千年宣言》之后，因而也是对世界人民的21世纪美好憧憬的最沉重的打击。因为这两场战争都违背了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即尊重国家主权与主权平等、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禁止在国际关系上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等基本原则。美国以追求其国家安全为名，以人类共同安全利益为幌子，依仗其“合法化霸权”，无视主权平等原则，肆意践踏别国主权，将某些主权国家划归为法外国家<sup>①</sup>，开列了所谓“流氓国家”、“失效国家”、“无赖国家”的名单。这种做法产生的结果是，“法外国家”被妖魔化，被国际社会疏远，长此以往将出现更可怕的“恶性循环”。

世界历史已反复证明，依靠军事力量无法确保霸权地位的长久。在这个问题上，使用军事手段是否具有合法性最为重要，而合法性需要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和当事国的邀请。国际法承认这两条干涉合法性的基本原则，而美国的这些军事行动根本就无合法性可谈。冷战后由美国主导的或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进行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除了海湾战争获得了联合国安理会授权外，其他都没有获得安理会授权，严重违背了联合国宪章原则和国际法基本原则。对这些战争稍加分析，不难看出美国发动战争的自私性和外交决策的不理性。

## 2. 国际恐怖主义挑战世界和平与安定

2001年发生的“9·11”事件是对人类文明的犯罪行为，有着深刻的国际背景。综合地看，就是南北发展差距拉大，美国霸权主义的刺激，以及全球范围的极端宗教势力和极端民族主义的复苏，将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纠缠起来，产生了极端民族主义分裂势力，更有某种国际政治势力的推波助澜。布什政府发动的反恐战争虽然得到国际社会的理解

---

<sup>①</sup> 参见杰里·辛普森：《大国与法外国家：国际法律秩序中不平等的主权》（朱利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0页。

与支持，但联合国至今未对恐怖主义的定义达成一致，恰恰反映了恐怖主义产生的复杂背景和不同文化背景国家对恐怖主义认识的差异。

我们看到的现实是，美国主导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持续将近十年，结果深深陷入战争的泥潭。而国际恐怖主义呈现分散化、网络化发展，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离主义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信息手段，形成跨国活动网络，已演变为对世界和平的严重威胁，日益威胁更多国家。可见，仅仅凭军事手段无法根除恐怖主义。而且由于美国的军事打击波及大量无辜民众，美国日益被看成是入侵者，而不是解放者。更严重的是，在阿富汗被推翻的塔利班力量大有卷土重来之势。在伊拉克，自萨达姆政权被推翻以来，境内教派冲突不断。宗教极端分子、民族分离分子利用阿富汗和伊拉克作为滋长的温床，煽动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自“9·11”事件以来全球已发生了36000多次恐怖袭击，近57000人死亡，伤亡总数达99000人。<sup>①</sup>其活动已从中东、欧洲蔓延至南亚、东南亚等地，巴基斯坦、印度、印尼、也门等国境内恐怖袭击频仍。反恐也成为国际间及各国所最关切的事项。

### 3. 非理性决策阻碍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的国际合作进程

冷战后，世界各国不仅仍面临着传统安全问题，还面临着非传统安全问题激增和发展的不平衡差距拉大问题。经济全球化既促进了世界经济总体发展、各国经济实力增强和社会繁荣、各国经济相互依存加深、国际经济合作力度加大，但同时谋求各自利益，不能很好地处理国家利益与世界总体利益之间的关系，阻碍了各国以理性合作应对全球性问题的挑战。与此同时，经济不可持续发展与资源消耗也带来了环境变化、资源竞争加剧等大量负面效应，形成循环怪圈：强大的利益驱动致使对自然资源无度开采，引起生态环境的恶化；资源枯竭带来能源危机，对

---

<sup>①</sup> Michael Krepon, “The Mushroom Cloud That Wasn’t – Why Inflating Threats Won’t Reduce Them,” *Foreign Affairs*, Volume 8, Number 3(May /June 2009), p. 2.

能源的争夺又引发冲突与战争；财富的集中、贫富两极悬殊<sup>①</sup>、资本和人力的快速流通引发更加复杂的社会矛盾。

经济全球化加速了世界经济发展，同时也让人类的生存环境受到无数威胁。金融动荡、粮食短缺、能源紧张、环境污染、犯罪滋生<sup>②</sup>、武装冲突、传染性疾病<sup>③</sup>等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全球治理呼唤对人的生存安全因素给予切实关怀，“人类安全”观应运而生。“人类安全”观超越国家安全观，以人的基本安全，即免于贫困、免于恐惧为终极目标，不同于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国家安全观。为实现这一目标，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在使人的基本物质资料得到满足的同时，让每个人都能享有尊严、享有和平、享有各项事务的参与权。<sup>④</sup>

肇始于2007年底的美国次贷危机，在2008年9月终于演化成一场深刻的全球性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影响范围广泛，从美、欧、日等

<sup>①</sup> 联合国发展计划署1997年发布的《人类发展报告》表明，人类发展的所有关键指标在过去几十年均显著提升，世界各地均呈现发展态势。然而数据显示，1997年全球最贫困人口的收入与最富有人口收入之比为1:78，为1960年1:30的2倍。另外，1996年全球最富有的20%人口占有世界总收入的85%，而1960年为70%，相反，1996年全球最贫穷的20%人口仅占有世界总收入的1.4%，反而明显低于1960年的2.3%。详见UNDP: *Human Development Report 1997*,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M. Castells, *End of the Millennium*, (Oxford: Blackwell, 1998)。

<sup>②</sup> 近年来，海盗猖獗，特别是索马里海盗已成为受高度关注的国际海洋安全问题。2009年4月，美国丹麦籍货船“马士基亚拉巴马”号被劫，美国籍船长理查德·菲利普斯被扣为人质，后于4月12日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成功解救人质。这是美国船只200年来首次遭遇海盗劫持。详见“美国船员夺回遇劫船只”，2009年4月10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4/10/content\\_11160765.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4/10/content_11160765.htm)。2009年4月以来，已有十多艘外国船只遭索马里海盗劫持。据联合国统计，亚丁湾海上走廊2008年共发生了111起袭击，比2007年增加了200%。2009年前三个月，已经发生了51起袭击。详见《当海盗——索马里年轻人“无法抵抗的诱惑”》，2009年5月4日《广州日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5/04/content\\_11306437.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5/04/content_11306437.htm)。

<sup>③</sup> 2009年3月底至4月中旬，墨西哥、美国等地接连暴发甲型流感病毒疫情。截至2009年5月4日，全球共有19个国家报告疫情，全球已确诊病例近千人，分布在墨西哥、美国、加拿大、西班牙、英国等国，已有23人死亡，其中墨西哥22人，美国1人。2009年5月4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5/04/content\\_11309220.htm](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9-05/04/content_11309220.htm)。

<sup>④</sup> Caroline Thomas, “Globalization and Human Security”, *Glob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curity*, eds. Anthony McGrew and Nana K. Poku,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07), pp. 107–131.

发达国家，到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等“金砖四国”，再到东欧、中东、非洲国家都难以幸免。在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金融机制下，在美国缺乏有效、严格的国内金融监管机制，纵容金融投机的驱动下，美国一国的金融灾难迅速演变成世界性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场金融危机虽然发生在国际金融领域，但也延伸到经济领域，影响到各国的经济稳定，也必然会蔓延到政治和其他领域，带来收益分配方面的更大失衡，激化一些国家原本就存在的社会矛盾，引发社会动荡。<sup>①</sup>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各国经济安全的高度相互联系与依存度。但美国利用美元的中心地位，一方面要求其他国家购买美国国债，帮助美国渡过危机，另一方面在寻求全球经济平衡的借口下，又打汇率战，对别国施加压力，同时采取种种措施，增发美钞，促使美元贬值，转嫁危机，甚至通过国会立法，迫使其他国家货币升值，以减少美国的债务压力。此外，贸易保护主义在国际上也还很有市场。总之，全球治理需要理性的合作，但是非理性思维仍妨碍国际合作。

#### 4. 国际核不扩散机制受到挑战

苏联解体后，原境内的大量核武器和核材料失去控制，成为一个巨大的核扩散源。1992年美国启动“合作降低威胁”计划，由美国向俄罗斯、乌克兰、哈萨克斯坦等国提供援助，协助它们销毁了大量核、生化武器及相关设备，并在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及材料和技术扩散方面进行合作。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的《2009年财政年度合作降低威胁年度报告》<sup>②</sup>表明，2008年国会批准划拨的援助金额达63亿美元。该项目目前进展顺利，已惠及113个国家，包括前苏联范围内的300个地区。在美国的援助下，中东边界、巴基斯坦、菲律宾港口都安装了辐射监视仪和其他监视设备，对即将离岸集装箱进行扫描。武器级核材料已被运

<sup>①</sup> 王辑思：《当代世界政治发展趋势与中国的全球角色》，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月，第46卷第1期，第11页。

<sup>②</sup> Department of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Annual Report to Congress Fiscal Year 2009*, <http://www.dtra.mil/documents/oe/ctr/FY09%20CTR%20Annual%20Report%20to%20Congress.pdf>.

送至集中存放地，并转移出危险区域。

尽管与1990年代相比，核威胁明显降低，但核材料和核技术扩散、生化武器扩散又成为新的威胁。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2007年编制的《打击非法走私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技术指南》<sup>①</sup>中提供的数据，截至2006年12月31日，世界各国向ITDB（Illicit Trafficking Data Base，“非法走私数据库”）报告1080起非法走私核及其他放射性材料案件，其中25%涉及核，70%涉及核材料，还有5%涉及其他放射性材料（主要是封闭放射源）。另外，自1993年以来，全世界共发生了13起涉及非法走私高浓缩铀（HEU），即可用于核武器生产的核材料案件。尽管这类案件数目较小，而且被盗的HEU量也很小，可能只用作样品，但目前已报告的失窃案和尚未追回的HEU，应该只是冰山一角，核材料黑市买卖活动依然非常活跃。

全球气候变化和能源危机迫使更多国家转向发展清洁的核电。自2005年以来，全球有25个国家表示有意发展核能，其中一半是中东国家。照此趋势发展下去，到2030年，全球有核反应堆的国家数目将是现在的2倍<sup>②</sup>，届时全球将面临极为复杂的防核扩散局势。因为如果一个国家拥有了核反应堆，在此基础上将低浓缩铀提纯、再加工成高浓铀或生产出武器级核裂变材料就不再困难。核扩散就不再是臆想，而是现实威胁。

由于某些国家无视国际规则，或拒绝遵守国际条约，或在规则执行上采用双重标准，其结果是：一方面助长了某些热点地区国家违反防扩散国际条约，发展核武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另一方面促使某些感到受到安全威胁的国家为了本国的安全而不顾他国的利益，执意挑战核不扩散条约，挑战不扩散国际机制。美国不仅在布什政府时期实行双重标准，与印度进行核合作，支持以色列，并且违反国际条约，不从热点地区撤出自己的核力量，影响了中东和朝鲜半岛等地的

---

<sup>①</sup> IAEA, “Combating Illicit Trafficking in Nuclear and other Radioactive Materials: Technical Guideline” (Vienna: IAEA, 2007).

<sup>②</sup> Sharon Squassoni, “Risks and Realities: The ‘New Nuclear Energy Revival’”, [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7\\_05/squassoni](http://www.armscontrol.org/act/2007_05/squassoni).

局势，成为国际社会新的热点。不仅如此，奥巴马政府还坚持进行亚临界点核爆炸试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全球合作机制还受到各种现实的挑战。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2010年国际社会将通过两次高级别会议来协调、促进防扩散和核裁军合作机制的建立，<sup>①</sup>要求各国以理性对待核不扩散机制受到的各种挑战。

综上所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大国主导的国际组织和合作机制远远落后于全球安全挑战，出现严重的“国际机制赤字”。国际机制赤字表现是多方面的。例如：联合国亟待改革，但进展缓慢；世界贸易组织亟须修补，但多哈回合谈判失败，世界贸易体制改革迟缓；国际金融机制监管不到位，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无力应付日益扩大的国际金融动荡；能源和气候变化等领域的合作机制亟待建立；对国际人道主义干预的原则和规则，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存在严重争议；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民族分离主义还没有达成共识，影响合作的深度与广度；各种非政府组织和跨国公司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不断增大，但其行为尚不规范，等等。

总之，全球性问题呼唤理性治理和有效的国际合作制度，只有科学理性决策，才有助于建立公平、正义、平等、互利、有效的国际机制，才能维护各国共享的利益，建立理性和和谐的国际社会。

### 三、文献综述

#### 1. 关于外交政策的研究

尽管外交政策研究是一门新兴学科，但有关对外政策的研究在国内外相关学术著作颇丰。外交决策研究已经发展成一个跨学科、多层次、多领域的综合性研究领域。

在美国，对外政策研究领域涌现出大批学者，从微观到宏观，从国

<sup>①</sup> 2010年4月全球“零核峰会”在美国华盛顿举行，5月联合国《不扩散核武器条约》审议大会在美国纽约举行。

家领导人的性格分析到国内因素的影响再到双层博弈的研究，从决策者/部门的理性选择到官僚机构的博弈再到决策的认知心理学分析，出现了不计其数的精致而深入的研究成果，为我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资借鉴的内容和有益的研究方法。其有着重要影响的学者主要有：肯尼思·华尔兹<sup>①</sup>、亨利·基辛格<sup>②</sup>、格雷厄姆·阿利森<sup>③</sup>、莫顿·霍尔珀林<sup>④</sup>、约翰·斯坦布鲁斯<sup>⑤</sup>等。

英国学者克里斯托弗·希尔的《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出版于2003年，是在冷战后全球化背景下，以变化了的、综合性的国际政治新视角来审视外交政策的力作。希尔指出，此项研究的大前提是世界是有序的，是能够被系统观察的<sup>⑥</sup>。希尔指出，当前国际政治陷入两难：一方面，全球化引起相互依存程度提高，另一方面，民族主义迅速高涨，反对国际共同体对民族自由的约束，出现了一些群体，甚至某些民族，主张实行以粗暴的利己主义为核心原则的对外政策。面对这样的现实，希尔强调对外政策不应局限于现实主义语境，所谓现实主义的对外政策就是只在国家利益框架内理解并制定对外政策。希尔认为应该在“全球治理”语境下，遵循民主与效率的原则，重构对外政策概念。这正应验了E. H. 卡尔的观点，健全的政治理论应既包含乌托邦主义也包含现实主义，既包含权力也包含道德价值。<sup>⑦</sup>

美国学者斯蒂芬·哈尔帕和乔纳森·克拉克2007年出版的著作《理

<sup>①</sup> Kenneth N. Waltz, *Foreign Policy and Democratic Politics: The American and British Experience* (Boston: Little, Brown, 1967).

<sup>②</sup> Henry A. Kissinger,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Three Essays* (New York: Norton, 1969).

<sup>③</sup> Graham T. Allison,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Boston: Little, Brown, 1971).

<sup>④</sup> Morton Halperin, *Bureaucratic Politics and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974).

<sup>⑤</sup> John D. Steinbruner, *The Cybernetic Theory of Decision*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4).

<sup>⑥</sup> Christopher Hill, *The Changing Politics of Foreign Policy*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3), preface xx.

<sup>⑦</sup> E. H. Carr, *Twenty Years' Crisis* (New York: Palgrave, 2001), pp. 10, 20–21, 93–94.